

中庸之道的现实意义

周建标

(中共泉州市委党校,福建 泉州 362000)

[摘要] 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和最高伦理道德标准。中庸之道对中国民众的个人修养、精神生活、为人处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中庸之道是做人做事之道。中庸之道在当今社会仍然有它的生命力。

[关键词] 中庸之道; 思维方式; 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2)02-0028-04

孔子从伦理政治的角度首先提倡“中庸”。《论语·雍也》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认为中庸是最高的道德境界,人们不了解它,已经很久了。孔子的孙子子思吸收了老子思想的天道观和常道论,写成《中庸》一文,使中庸思想不仅概括人伦而且概括物理,形成完备的中庸哲学体系,形成了中庸之道。经过宋元明清的普及,中庸之道成为儒家思想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和最高伦理道德标准。

一 中庸之道的含义

中庸之道是农耕民族的生活智慧,企求安居乐业、稳定平和。经过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提炼,中庸之道成为调节社会矛盾,达到“中和”状态的哲理。中庸之道发端于农耕社会,又效力于农耕社会,为农耕社会赢得必需的稳定与祥和。中庸之道用于个人修养,能够养成温顺谦和的君子风度;中庸之道用于政治,可抑制豪强,均分田产和权利;中庸之道用于文化,可求同存异,兼容并包;中庸之道,用于风俗,可不偏颇、不怨尤、不走极端,入情入理、内外兼顾。

中庸之道的最高境界是“中和”之境。中庸之道的手段是“执两用中”,中庸之道的目的是“致中和”。《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子思把孔子提出的“中庸”,由“至德”提升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的哲理高度,进而把“中和”提高到天地万物各得其所和生长繁荣的根本道理,把“中和”视作

天人合一的哲学境界。

二 毛泽东邓小平活用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的思维方式主要有五种:一是在认识论上采取“叩其两端”而取“中”的认识方法;二是“执其两端,而其用中于民”的“执两用中”法则;三是在纵向的时间发展观念上采取因时制宜的“时中”法则;四是在横向的不同事物的关系上采取执中致和的“中和”法则;五是在特殊情况,采取原则性与灵活性辩证统一的“执中行权”法则。中庸之道的五种思维方式,是儒家立身处世和治国安民的基本方法。毛泽东和邓小平活用中庸之道的思维方式,从而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一)“叩其两端”的认识方法与《论持久战》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教导干部要:“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1]110}

毛泽东借鉴孔子“叩其两端”而取“中”的调查方法,从同一事物的正反两方面进行调查研究,进而掌握其本质规律。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针对“亡国论”和“速胜论”,发表了《论持久战》,全面客观地分析了中日双方的优势和弱点,指出“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科学地预测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和特点,为中华民族赢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战术。

据白崇禧当时的秘书程思远回忆,武汉会战结束后,在陪都重庆,周恩来第一次向白崇禧介绍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白崇禧很赞赏,认为这是克敌

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论持久战》介绍给蒋介石,蒋介石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周恩来)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2]。

(二)“执两用中”法则与“一国两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始终致力于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自1979年以来,中国政府从台湾的实际情况出发,考虑到炎黄子孙的心理认同和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并首先运用于解决香港的回归问题。

香港回归,原本是个棘手的难题,太过软弱则难以收回,太过刚强又会冒兵戎相见的风险。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采取中庸之道“执两用中”,倡导“一国两制”模式,让中国人、英国人和香港人都能接受,为香港顺利回归,奠定了坚实牢固的政治基础。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怀抱;1999年底澳门政权的交接,结束了外国人在中国国土上建立殖民地的历史,雪洗了中华民族近现代的耻辱。今天,中华大一统的观念,仍然牵动着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心,都在为祖国的最后统一而努力。

邓小平针对台湾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一国两制”发展战略,令台独分子无计可施,用无声的语言向全世界宣告:不管“台独”势力如何嚣张,祖国和平统一的大业,乃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三)“时中”法则与《新民主主义论》

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量变质变。《中庸》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意思是:君子之所以能达到中庸的境界,是因为他的言行时时刻刻适中。

毛泽东创造性地将“时中”思想融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之中,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在坚持正确路线的同时,坚决与落后于时代的右倾机会主义(“不及”的错误)与超越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左”倾冒险主义(“过”的错误)作不懈的斗争。例如,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主张中国无产阶级只有等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取消了领导当时的革命运动,直接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与此相反,稍后的分别以李立三和王明为代表的两次“左”倾盲动主义者则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端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并因此规定了若干不适时宜的“左”倾政策,于是造成

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则分别同“左”右倾错误路线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遵义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

毛泽东创造性地将“时中”思想融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之中,提出《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并用于指导革命实践,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3]665}当时,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工人阶级的力量还相当弱小的旧中国,直接发动并且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则是一种“拿鸡蛋碰石头”的冒险,是没有出路的。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庸思想的“时中”法则,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分两步,第一步,要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新民主主义论》指导下,建立了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以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为同盟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成功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四)“中和”法则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毛泽东把儒家处理矛盾的“中和”法则运用于革命实践,正确处理各种事物间的矛盾关系。突出表现为毛泽东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以民族大义和人民利益为重,毛泽东勇敢大度地抛弃前嫌,对地主资产阶级和大小反动军阀,毅然采取和平相处的战略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事和时机,向强大凶悍的日本帝国主义宣战,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毛泽东领导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是毛泽东合理运用中庸思想典范。

此外,毛泽东在正确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方面,诸如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民之间、军政之间等等关系时,也都能恰如其分地运用“中和”法则以收到最佳的效果。

(五)“执中行权”法则与毛泽东的游击战术

灵活机动,古代称之为“权”或“权变”。《孟子》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谓“执一”,若用现代

语言解释,就是一种以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看问题的形而上学方法,脱离了事物随时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孟子认为,只有既“执中”又能行“权”,才是真正的适得事理之宜的中庸之道,即在具体实践中既要贯彻“中”这一基本原则,又要根据实际情况而有所变通,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中”与“权”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

毛泽东把“执中行权”的中庸法则与马克思主义“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灵活机动的思想方法。毛泽东的灵活机动的思想方法突出表现在军事上,形成“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游击战术。

毛泽东认为,尽管战争有种种的战术或方法,然而,“懂得这些战术是容易的,灵活地使用和变换这些战术,就不容易了。这里有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3]494}这种“运用之妙”,可谓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之精髓。

由于事物的变化和发展总是随着时间的运行而实现的,所以“执中行权”的法则也往往与“时中”的法则联系在一起。而且,也正因为中庸之道包含有“时中”与“执中行权”两项内容,才使得中庸之道并非死的教条而是活的灵魂。

(六)晚年毛泽东背离了中庸之道,犯了严重错误

毛泽东到了晚年,由于客观环境起了变化,逐渐背离了自己平生所认为正确的中庸之道,竟在思想方法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从而反证了中庸之道的现实意义。例如:

1、在处理各种矛盾方面,违背了协调内部矛盾的“致中和”法规,导致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反右派斗争击退了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澄清了思想上的大是大非,稳定了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到1958年秋,整个运动结束时,全国共划了右派分子55万多人,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党的干部和政治上热情而不成熟的青年学生错划为“右派分子”。

2、在认识论上,脱离了“叩其两端”而取“中”的全面调查研究的方法,犯了过犹不及的错误。错误地估计了社会的实际情况,盲目地作出了某些不符

合实际的指示,酿成了1958年超越时代客观条件的大跃进和共产风,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3、在历史发展观上,违背了与时俱进的“时中”法则。在“文化大革命”乃至“批林批孔”期间,毛泽东明确地提出批判中庸之道,片面地重提他在20世纪20年代革命初期提出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1]17}的观点,成为“宁左勿右”论者的理论根据,把“左”的错误推向了极端,从而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严重挫折。

真可谓,成也中庸,败也中庸。综观毛泽东一生,当毛泽东正确运用中庸之道的时期,中国革命就取得胜利;当毛泽东晚年背离中庸之道的时期,就给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

三 中庸之道是为官之道

中庸之道是为官之道。据《论语·尧曰》记载,尧把治国秘诀“允执其中”传授给舜,舜传授给禹,在他们交接班时,都告诫其下任要坚持中庸之道。

(一)为官者是民众的楷模

《礼记·王制》孔颖达(574—648)疏:“官者,管也。”点出“官”的要义是“管”,含有管理、掌管之义。做官者就是为民众管人管事者。因此,为官者首先是受到民众拥护的人,是道德高尚,思想端正,办事精明干练的人。《论语·颜渊》:“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小正?”意思是:“为政者就要端正自己。您带头端正自己,谁敢不端正。”《荀子·君道》:“楚庄王好细腰,故朝有饿人。”所以为官者要做民众的楷模,就必须不谋私利,身先士卒,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二)为官者要有群众观念

孔子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以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意思是:“舜真具有大智能啊!他喜欢征询别人的意见,就算是浅近的话,也欢喜省察它的含意。把别人的错误和不好的意见隐藏起来,同时又表扬别人正确的好意见,最后再将众人的意见综合起来,取其中道,施行于人民,这就是舜之所以为天下百姓拥戴的缘故吧!”大多数人的意见,就是舜的看法。舜的群众观念强,依靠大多数人的支持,所以才能成就大事业。《荀子·王制》:“君者,善群也。”管理者就是善于把众人团结起来,形成合力,善于为群体谋利,善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三)为官者既要“尊贤”,又要“亲亲”

为官者既要“尊贤”,也要“亲亲”。管理一个单

位,重要的是“尊贤”。尊重、重用人才是做好管理工作的前提。《论语·为政》:“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鲁哀公问:“怎样才能使百姓服从呢?”孔子回答说:“把正直无私的人提拔起来,把邪恶不正的人置于一边,老百姓就会服从了;把邪恶不正的人提拔起来,把正直无私的人置于一边,老百姓就不会服从统治了。”选拔优秀人才作为群众的带头人、管理者,群众就心悦而诚服;选出劣等人放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群众就坚决不服从。所以历代善管理者无不重视“尊贤”、“用贤”的问题。

而重视亲情、宗族血缘关系的管理方法,争议较多。但《中庸》说:“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中庸》把“尊贤、亲亲”并列,认为二者是管理所必须的,有利于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力量;有利于“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有利于团结各方面人士共同完成奋斗目标。充分体现了《中庸》管理思想广泛而丰富,不偏用任何一种做法,不绝对化。

(四)为官者要统观全局,高瞻远瞩

《中庸》:“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意思是:君子的道,在日常用度当中,从夫妻生活开始,它的最高境界却与整个天地相通,昭示着天地万物的根本道德。为官者要把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管好,需统观全局,高瞻远瞩。《商君书·史法》:“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为官者要有长远、广阔的预见能力,先于众人作好趋利避害的思想准备。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带领民众去完成共同的事业。

四 中庸之道是做人之道

中庸之道是做人之道。中庸之道在当今社会仍然有它的生命力。

(一)人性修养需要中庸之道

“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人是动物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人的动物性表现为物欲和性欲。《礼记·礼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也说:“食、色,性也。”人的社会性表现为精神欲望。假如人只有社会性,而没有动物性,单纯为某种精神理念而活,冻死、饿死也不起来改变现状,那社会就不会有变革,也不会有进步,甚至人类也不能继续繁衍。假如人只有动物性,而没有社会性,人便单纯为物欲和性欲而生存,成了赤裸裸的动物,社会就会大乱。所以人身上的动物性与社会性必须和谐统

一。而人身上的动物性与社会性究竟应占多大比例?这就是“度”的问题了。一般地说,在社会安定时期,人的社会性比较明显;而在社会变革时期,人的动物性就凸显出来了。如何正确地处理好动物性与社会性的关系,使其保持和谐平衡的状态,就必须借助中庸之道“执两用中”的智慧。

(二)人格修养需要中庸之道

儒家认为人格修养好的人方可称为“君子”,而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君子”呢?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思是说,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浮夸虚伪。只有文采和朴实配合适当,才能算是君子。孔子所谓“文质彬彬”,是要求人既文雅又朴实。而文雅与朴实在一个人的身上如何和谐统一,“文”与“质”两者之间的“度”又如何把握呢?也要靠中庸之道来加以调适。

(三)人际交往需要中庸之道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亲情关系、友情关系、爱情关系,以及上下级间的关系,同事间的关系,邻里间的关系,实在是一门大学问。这一系列的关系对中国人来说,似乎又显得格外重要。如果说西方文明所注重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阿拉伯文明所注重的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中国人最注重的便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

人与人之间究竟应该保持多大距离?人际交往的“度”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但有一个原则是既不能太疏远,也不能太亲密,遵循着“刺猬法则”。刺猬在冬天很怕冷,所以要挤在一起相互取暖。距离近了,它们身上的刺又会扎伤彼此的身体;距离远了,相互间借不着热气。于是经过调整,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距离,既能互相取暖又不会互相伤害。人际间的合适距离就是中庸之道所说的“执两用中”。

(四)工作需要中庸之道

我们经常说“做好本职工作”。用《中庸》的话来说,是“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意思是:君子应该立足于本职工作,做好份内的事情,而不做份外的好高骛远的事情。“素富贵,行乎富贵”,富贵者应该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可以扩大投资,也可以做慈善事业。“素贫贱,行乎贫贱”,贫穷者应该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可以自强不息,也可以安贫乐道。(下转第122页)

(上接第 31 页)

“素夷狄,行乎夷狄”,生活在边疆地区的人们,应该踏踏实实地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去做事情,而不是埋怨条件差或地理位置不好。“素患难,行乎患难”,在患难中应该选择坚强,而不是退缩,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中庸之道告诉我们,要取得成功,首先要有适应现状的能力。一个不能适应现状,在现实面前手足无措的人是很难成功的。

[参考文献]

- [1] 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 程思远.我的回忆[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4:131.
- [3] 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The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f the Golden Mean

ZHOU Jian-biao

(Party School, CPC Quanzhou Committee, Quanzhou 362000, China)

Abstract: The golden mean is the Confucian outlook,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and the highest ethical and moral standards. It has a far-reaching impact for personal cultivation, spiritual life, communicating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eople. It forms the Chinese cultural character. It is the way of the person to work. In today's society, the golden mean still has its vitality.

Key words: the golden mean; way of thinking; realistic significance